

● 席克正

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促进财政科学发展的重要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济研究中曾经运用大量比较研究的方法,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科学的科学成份,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虽然早已有之,但是作为一门经济学科的比较研究则开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在西方经济学中,比较经济制度研究占有领先的地位。

在社会主义国家,以斯大林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苏联三十年代形成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制度,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模式,不仅不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建设中的经验,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和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用的理论与知识。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谈不上任何比较研究。

我国理论界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对比较经济制度研究还是很陌生的。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和开放政策以来,才为比较经济学的引进和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环境。这种转变是同我国改革和开放的实践分不开的。当然比较财政研究起步就更晚了。

从比较经济制度研究在西方和我国发展的过程来看,尽管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也存在彼此进行研究,相互吸取成功的经验,借鉴行之有效的办法,以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我国的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就不会有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没有比较研究,从比较中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要取得十多年来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也是有困难的。

现代资产阶级财政学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深化,社会各种矛盾更趋激化的情况下,垄断资产阶级国家为强化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干预,利用财政手段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炮制的理论。就其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来说,也是反科学的,应该加以批判。但要看到,现代资产阶级财政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变化,在增加财政收入和有效地使用财政支出;在利用财政税收等财政范畴的杠杆作用,以稳定和发展经济;在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等方面,也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东西,特别是在以下三个方面,更有借鉴的价值。

(一) 财政理论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考查资产阶级财政理论的发展,将会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那就是财政学不仅反映经济学所取得的成果,而这些经济研究的新成就进一步丰富财政学的内容,加深财政理论研究的深度。可以说,资产阶级财政学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它的理论基础。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一般经济理论和财政学说在租税归宿问题上的关系。租税归宿问题是资产阶级财政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它研究税收负担最终归何人承担的问题。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级、阶层的切身利益。因此,长期以来受到资产阶级财政学家的重视。但是,租税归宿问题的发展同当时经济学中有关价

格和分配理论有密切的联系。例如，亚当·斯密根据年生产物的价值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的命题，指出：“每种赋税，归根到底，必定是由三种收入源泉的这—种或那—种或无区别的由这三种收入来源共同支付。”^①因此，他把租税分为工资税、利润税、地租税和三种收入源泉都要支付的人头税和消费税。斯密把税收归宿理论同他的价值论，分配论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税收归宿问题看成是在生产三要素之间税收负担的分配问题，从而建立了资产阶级税收经济学的基础。

税收公平和效率问题的探讨，一直是资产阶级财政学中的一个长时期有争论性的热门话题。但是，这个问题的—发展，也是与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的。早在古典学派时代，亚当·斯密对税收“公平”的含义曾经作过论述，这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纳税人所承担的税负应与其支付能力相—致；以及纳税人对国家的贡献应与他从国家保护下所得到的利益相—致的论述。但是，近代税收公平问题的研究，直到资产阶级边际效用论出现后才有新的发展。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 Mill）提出“公平”的标准是指纳税人之间的平等牺牲，即纳税人因纳税所损失的效用应该相等的原则以后，英国经济学家埃及华斯（Edgeworth）主张所谓“公平”应体现纳税人之间的边际平等牺牲；荷兰经济学家司徒华得（Stuard）又—进一步提出绝对平等牺牲和比例平等牺牲说以解释“公平”的含义。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的上述三个“公平”的标准，当然是反科学的，但它说明现代资产阶级财政理论的发展是与经济理论的发展密切联系的。

关于税收效率问题的研究，比较早的理论也是来自亚当·斯密。斯密在论述税收原则时正确地指出，国库收入与人民交纳税款之间的差额应是最小，这就是说，政府用之于征税的费用应该最少。过大的征税费用，不仅会减少国库收入，对纳税人来说也是一种超额负担。用现代资产阶级财政学的术语来说，凡是产生超额负担的税收，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税收。

但是，税收效率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是在边际效用学派产生以后。当前研究税收效率通常使用的“消费者剩余”的概念，便是出自于效用学派门格尔（Menger）和杰文思（Jevons）的著作里。而第一个用供需曲线来分析税收归宿的学者则是金肯（Jenkim），他用供需曲线图分析税收负担是怎样超过税收收入的。而这个超过部分，在现代资产阶级财政学中被称之为“超额税负”（Excess Burden）。此后，“消费者剩余”这个概念成为资产阶级税收经济学中对税收效率评价的重要分析工具。近年来，“消费者剩余”更广泛地被用于最适税收制度问题的研究。

至于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理论，是资产阶级财政学中研究时间最长，争论较多至今还未全部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它主要研究政府也就是公共部门为什么要提供公共产品，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以及提供多少等问题。

近代公共产品理论试图把微观经济学中关于消费者如何在市场上对商品作出选择的理论，应用到公共产品的分析中来，以决定怎样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它不同于传统理论之处是，不是研究国家有责任提供公共产品的必要性；而是研究从消费者对公共产品需求的角度探讨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必要性。从而奠定了近代公共产品理论的基础。

现代资产阶级财政学的巨大变化更是同凯因斯理论密切联系的。如果没有所谓的“凯因斯革命”，可以说就不会有西方财政学的宏观分析；如果没有所谓“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古典学派传统的财政理论，多年来为资本主义国家信守不渝的健全财政原则和公债有害无益的观点以及财政赤字是最大的祸害等财政信条就不会被现代西方财政学所抛弃。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资产阶级财政理论的发展变化与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资产阶级财政学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吸收和反映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以充实和丰富财政学的理论内涵。

解放后，我国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受苏联财政学的影响较深。苏联理论界把财政学作为财政部门指导财政工作和财政实务的一门实用性学课，偏重于传授财政税收工作实务方面的知识；着重阐述现有的财政方针和政策；解释当前的财政规章制度，而不重视财政理论与经济理论研究的相互结合，忽视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去探索财政范畴自身运动的规律性以及与其它经济范畴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以致财政学的理论单薄，内容枯燥，局限于预算收支管理的狭隘传统。苏联财政学中长期存在的这些缺陷，在我国财政学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财政学的研究才逐步地摆脱传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取得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发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指导下，我国的财政理论工作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统一，借鉴国外理论和实践中有用的内容，紧密围绕改革开放中不断涌现出来的财政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一批有观点、有分析、有建设性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成果，为发展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作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变革刚刚开始，要彻底改变目前财政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

在国家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财政不过是筹集资金、分配资金以保证国家计划完成的工具，财政的作用是有限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财政的作用就不仅限于筹集和分配资金，财政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有更重要的作用。财政学的研究必须根据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探索财政收支活动的内在规律，研究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财政、税收和公债等财政范畴对国民经济的分配、交换、生产和消费等的影响。我国财政理论研究的深化以及财政学的发展，有待于财政理论研究紧密地结合经济理论研究，摆脱过去偏重于预算资金分配的狭隘研究范围，这是在财政比较研究中得出的一点可以借鉴的内容。

（二）理论研究离不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合。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财政学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财政学的研究借助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所谓实证分析，就是按事物的本来面目描述事物，说明研究对象“是什么”，不加任何主观评价，着重刻划经济现象的来龙去脉，概括出可以通过经验证明正确或不正确的基本结论。

实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主要是当前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流行的数量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借助于来自现实中的各种数据，建立一定的模式，计算模式中各种参数的值；通过模式检验各种理论与现实符合的情况，以证明理论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尽管数量分析方法，还存在一些缺陷或一定的主观性，但是，这种分析方法，使理论研究更为严谨和准确，理论框架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并有助于提高财政学的实用价值。

数量分析方法运用于财政决策分析，更具有科学性。因为任何财政决策，最后都会表现为数量问题，如预算收支结构和规模，税收总量和税率，预算盈余或赤字，公债规模与数量等，都是量的问题，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和确定这些数量问题，比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不仅较为准确，效果也会更好。财政学数量化的倾向，是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学者公认的财政学研究方法的一大进步。

所谓规范分析研究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即确定若干准则，并据以判断研究对象如财政制度或财政政策是否符合确定的准则，如不符合这些准则，则应进一步探讨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的改革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带有主观评价性，而不象实证经济学对研究对象不加任何主观评价，只是对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客观描述。

规范经济学的分析是以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如果我们撇开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局限性，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本质，仅以规范经济学的任务来看，它是在探索一种为制约政府活动，评价政府活动好坏的标准，尽管它带有一定的主观判断的意见，但有那么几条准则，如公平准则，效率准则等，对制约决策者的任意行为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现代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数量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从而促进财政学研究方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十多年来，我们在对资产阶级财政经济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和借鉴的同时也积极吸取西方有益的东西，特别是借鉴数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但是，应该看到，数量分析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经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数量化，但是不能用数量方法代替其他分析方法。当前资产阶级经济学科研究中出现过份数量化的趋势，导致西方经济学片面追求分析方法的精巧细致和数学公式的高深复杂，缺乏联系和研究实际问题的目标和兴趣，这是我们在借鉴西方研究方法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三)重视政策研究的作用和地位。理论的源泉是丰富多彩的实践。任何有价值的理论都是实践的总结；任何有价值的理论都有指导实践、变革实践的作用。理论不能指导实践活动，不能为现实服务，就是没有价值的理论，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算是理论，而是少数人冥思苦想、闭门造车的无效劳动。

理论如何才能指导实践？那就要借助于政策的桥梁作用。当人们认识和掌握了财政实践的内在规律性，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各种财政政策，有意识地运用政策去实现政府预定的各种财政目标以影响实践和变革实践。可以这样说，研究财政理论而不研究财政政策，理论就失去指导实践的作用，最有价值的理论也会成为一种浪费。

资产阶级财政学对政策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二个阶段，在凯因斯理论出现以前，财政政策研究的范围，仅限于财政微观政策的探讨，偏重于财政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影响。也有少数的资产阶级学者，如马尔萨斯、赛伊等人对财政宏观政策有过研究和论述，但建树甚少，也没有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凯因斯理论出现后，他一反传统的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经济理论，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有大量的非自愿失业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他主张国家干预国民经济活动，并提出政府大量增加财政支出以弥补私人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的建议；并强调采用发行公债，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的办法来提高“有效需求”，以稳定经济，保证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把财政学的研究内容同宏观经济学的内容紧密地结合起来，摆脱了财政研究不联系经济问题只注意财政收支的传统狭窄内容；开始重视探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公债政策等对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财政支出、税收、公债等财政变量对社会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投资、储蓄、消费、就业等宏观经济范畴的作用，大大开拓了财政学研究的内容，丰富了财政学的理论内涵，提高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创了宏观财政政策的研究；进一步把宏观财政政策和微观财政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理论、政策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比较财政研究不仅不排斥借鉴资产阶级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中有些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客

观规律和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管理知识以及科学的分析方法等。即使是反映资产阶级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应加以区别对待，不宜全部否定。对于那些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不利于劳动人民的政策，应予以反对和批判；但对于那些反映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政策，就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批判地借鉴和利用。例如，资本主义为国家解决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矛盾，采用经济政策、财政政策等以平衡社会总供需的经验，就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尽管我国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矛盾，不是生产过剩，而是供应不足，特别是供应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的情况更为严重，促使矛盾长期不能解决。但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经济政策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些启示：首先，国家应重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认识财政政策在促进社会总供需平衡，以及稳定经济和发展经济中的作用，改变把财政仅仅看成是实现国家计划的一种单纯筹集资金的手段。其次，在认识我国经济主要矛盾的基础上，逐步采用财政收支平衡政策，以控制过大的社会需求，促使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实现基本平衡。再次，为实现社会总供需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国家应采用促使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财政政策，使那些社会需要和消费者爱好的产品不断增加，在解决供需结构矛盾的基础上，实现供需的总量平衡。

比较财政政策研究，既要重视财政宏观政策的研究，也不应忽视财政微观政策的借鉴。宏观财政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实现社会总供需平衡的问题；而微观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的发展。诸如资本主义国家对企业所采取的加速固定资本折旧的政策，鼓励企业增加投资的政策，照顾企业亏损的补贴政策，以及解决企业资本短缺困难的低息贷款等微观财政政策，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凡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调动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微观财政政策就应该加以借鉴或采纳。

在比较借鉴其他国家财政政策时，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理论界要改变过去不研究政策的偏向，把研究政策问题摆在重要的地位，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预定目标，研究并制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经济政策。

在对资产阶级财政学的比较研究中，从研究方法到具体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探讨了一些可以借鉴并为我所用的内容。总的来说，借鉴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经济发展的进度，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条件的差异，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生搬硬套。更要认识到我们有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有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在比较研究中要有这样的坚强信念：坚信社会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又不能完全排斥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批判地吸收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思潮中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样的信念才能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会把糟粕当作精华，全部搬了过来。

当然，在比较研究和借鉴资产阶级财政理论、实践和政策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我们能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修正错误，不断创新，我相信比较财政研究对促进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发展和提高财政政策的水平是有益的。

注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84页。